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形象结构、源流及功能分析

Analysis of the Image Structur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the Inlaid Turquoise
Bronze Medal Decoration

孙蒙蒙

Sun Mengmeng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系, 北京, 102488)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内容提要: 本文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铜牌饰的构成要素进行分类解读。通过对其形象结构、源流等方面的解析, 认为这些铜牌饰接受了南北方龙文化崇拜, 并在借鉴融合不同动物纹饰、外形特征、艺术表现形式的基础上, 创新并发展了本地区以“龙”为主体地位的精神象征。

关键词: 铜牌饰 眼睛 额冠 文化融合 身份象征

Abstract: Based on the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inlaid turquoise bronze medals, this paper classifies and interpret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bronze medals, and analyzes their image structure, origin and other aspect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se bronze medals have accepted the worship of “dragon” culture in the south and north, and have innovated and developed the spiritual symbol of “dragon”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region on the basis of draw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animal decorations,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Key Words: Bronze medal decoration; eyes; crown; cultural integration; identity symbol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信仰及有机质、青铜镶嵌绿松石复合工艺制作水平。诸多学者对其形制与分期、来源与传布、工艺与纹饰寓意等做过探讨, 为后续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基于型式划分基础上的形象结

构、源流及使用功能方面的问题仍比较复杂, 关注较少, 需要结合横向、纵向的文化背景来考量,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发现、类型与年代

目前共收集到31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其中7件为考古发掘所获, 其他均为采集品或收藏品。基于明确的出土层位, 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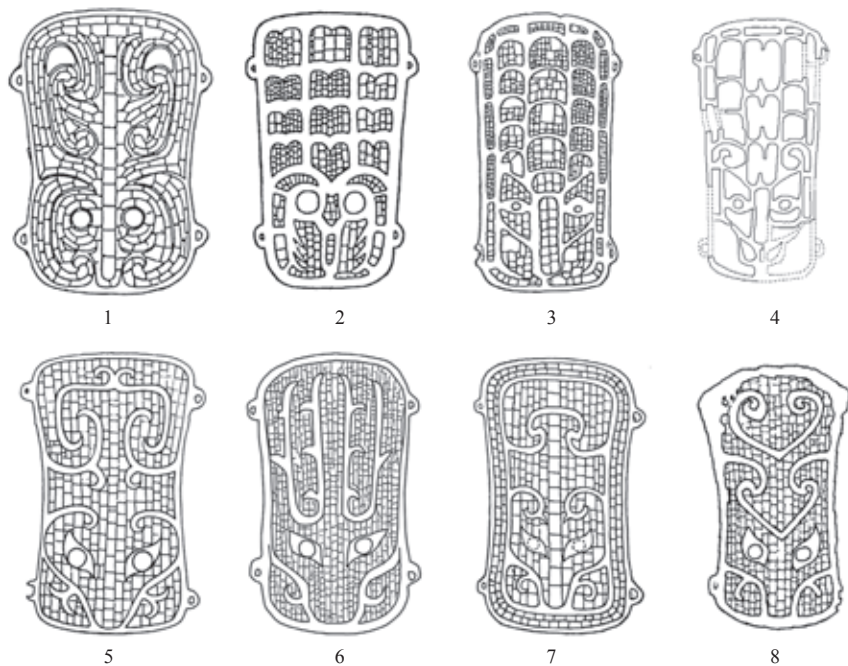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一)

1. Aa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81YLV4:5) 2. Ab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87M57:4) 3. Ab型(日本美秀美术馆藏) 4. Ab型(甘肃广河齐家坪采集) 5. Ba型(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第1件) 6. Ba型(美国檀香山艺术学院藏) 7. Ba型(1991年伦敦“中国古文物展”) 8. Ba型(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第2件)

同出遗物作为参照,学者基本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年代与简报推测年代一致,个别铜牌饰的年代或略晚^[1],其中四川地区出土的4件铜牌饰的年代基本定为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或存在缺环^[2]。国内外收藏品的年代,多在参考二里头出土铜牌饰年代的基础上进行判断,但观点并不一致。

依据纹饰、镶嵌工艺,本文将其中16件铜牌饰划分为三型。其中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出土多例成片散乱的绿松石片,并有铜铃伴出,一些学者称其为非金属托类牌饰^[3],但无法判断形制及纹饰,还有其他几件馆藏铜牌饰也无法进行形制方面的讨论。

A型 共4件。圆形目,分为上、下两大区域。依据上部区域纹饰及绿松石镶嵌的差异可以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1件。牌饰的上部为一对称内卷的蘑菇角,以绿松石嵌片塑形。二

里头遗址铜牌饰(81VM4:5)(图1-1)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最具特色的一件,整体呈略带束腰的圆角长方形,上部较下部稍宽,牌面中部纵向微弧凸,两长边侧缘各铸两半圆形穿孔,铜牌饰先铸造出兽面的基本形状,再将321块形状大小不一的绿松石嵌片镶嵌排列于铸造的铜底座上形成兽面,绿松片的大小、形状由兽面纹饰的排列决定。整个牌饰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主要刻划兽面的嘴、目、鼻。其中,以玉镶嵌球形双目,其外围周边用1—3圈的绿松石嵌片衬托双目,再向外是三道嵌片围成弯月眉,双目中间为笔直的中脊,一直延伸至牌饰上部的最外圈嵌片内侧,中脊前端为鼻部,由一圆角嵌片及外侧嵌片组成。

Ab型 3件。牌饰的上部为圆角梯形、心形、马蹄形的龙鳞纹。先铸出纹饰的轮廓,再以绿松石嵌片填充。二里头遗址铜牌饰(87M57:4)(图1-2)整体上宽下窄,两侧各有两个穿系孔,侧边较直,牌面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为十二个马蹄形的龙鳞纹;下部为片状圆目、弯月眉,双目中间为鼻,但分上下两个区域,上颌两侧各三组利齿,中脊两侧纹饰对称。日本美秀美术馆藏铜牌饰(图1-3)上下基本等宽,两侧各有两个穿系孔,牌饰最外圈划分为若干个小的长条区域,其内侧可分上、下两个区域,界限不明显,上部为十二个圆角梯形的龙鳞纹,中部圆角梯形大于两侧,应为中脊,中脊两侧纹饰对称,小弯月眉紧贴上部

龙鳞纹，铸造圆形眼，上下均为三角形区域，长鼻，两侧为菱形上颌；甘肃广河齐家坪采集铜牌饰（图1-4）只剩下铜铸兽面纹框架，绿松石已遗失，形制与日本美秀美术馆藏基本一致，仅中脊部位为亚腰方形龙鳞纹。

B型 共9件。梭形眼，上颌及鼻部呈倒几字形，耳内卷，与前部的几字形构成心形头部轮廓，额部戴高冠，整体上下部等宽，中部呈亚腰形，两侧各有两个穿系孔，装饰纹样均由铸造技术完成，绿松石嵌片纵向平铺整个牌面作为底纹。根据口部两侧是否吐须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5件。口部吐须，可分为两式。

I式 3件。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第1件（图1-5），上颌两侧各吐双须，额部正中饰高冠略后卷，顶

部伸出两小角，或为羽毛。中脊处的绿松石片最大，其余嵌片均小。1991年伦敦“中国古文物展”铜牌饰（图1-7）主体纹饰与边框直接镶嵌两圈绿松石片，内侧铸造出牌饰平行于边框的外轮廓线，以大绿松石嵌片纵向镶嵌作为笔直的中脊，两侧绿松石片均小于中脊，上颌两侧吐单须内卷，额部所戴冠比较小，也略后卷。美国檀香山艺术学院藏（图1-6）亚腰存在但已不明显，绿松石嵌片已不具备中轴对称，整体偏小，上颌两侧吐单须外卷，无耳，额部饰带枝杈的高冠。

II式 2件。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第2件（图1-8），上颌两侧吐单须内卷，额部上下分饰两个心形图案。保罗·辛格藏品第1件（图2-1）铸造纹饰面部几字形线条比较僵硬，上下外框对应的部位均铸出两处凸起，额部饰高冠，冠上部伸出两内卷角，冠内部、额上方饰一水滴纹，额部饰一菱形纹，其下部为人形鼻，耳部内卷并加饰两弧线。

Bb型 4件。口部不吐须。二里头遗址铜牌饰（84VM11：7）（图2-2）两侧纹饰及纵向绿松石镶嵌以中脊为轴对称，高冠后卷，牌饰上部伸出的弧线及三叉纹饰或为冠顶部的装饰。保罗·辛格藏品第2件（图2-3）高冠分歧尾，绿松石嵌片纵向平铺，耳上翻内卷，牌饰上下边框各伸出两



图2 国内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二)

1. Ba型(保罗·辛格藏品第1件) 2. Bb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84VM11:7) 3. Bb型(保罗·辛格藏品第2件) 4. Bb型(甘肃天水秦城采集) 5. Bb型(1999年纽约“古代中国青铜器与陶瓷器展”) 6. C型(四川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87GSZ:36) 7. C型(四川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87GSZ:16) 8. C型(四川广汉高骈机制砖瓦厂采集)



须。甘肃天水秦城铜牌饰（图2-4）上部边框伸出一似羊角的卷纹，与二里头84ⅤM11：7铜牌饰顶部三叉相似。1999年纽约“古代中国青铜器与陶器展”铜牌饰（图2-5）耳部微卷，额部饰上宽下窄对称分布的冠。

C型 共3件。上部方下部略圆，两侧各有两个穿系孔，铸造纹饰均对称分布，绿松石镶嵌起点缀作用。仓包包祭祀坑87GSZ：36（图2-6）中部四个菱形区域，以两个圆圈为中心两侧对称铸出凸起，绿松石嵌片铺作底纹，顶部及底部的四个区域仅铸有凸起。仓包包祭祀坑87GSZ：16（图2-7）对称分布S形、三角形、弧形纹饰。四川广汉高骈采集铜牌饰（图2-8）对称分布连弧形、马蹄形、方形、三角形纹饰。

Ab型铜牌饰牌面上宽下窄，弯月眉，圆眼，中脊笔直，中脊两侧纹饰对称。日本美秀美术馆藏、甘肃广河齐家坪采集铜牌饰最外圈划分为若干个小的长条区域，是对Aa型二里头81ⅤM4：5铜牌饰相关部分的继承和发展。笔者认为A形牌饰上部区域的纹饰是对动物躯体的具象刻画，Ab型显示的是动物背部的花纹特征，例如二里头81ⅤM4：5铜牌饰的上部着重塑造了一对称内卷的蘑菇角。二里头87M57：4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新出现的一类背部带有龙鳞纹的牌饰，而日本美秀美术馆藏、甘肃广河齐家坪采集铜牌饰则是二里头81ⅤM4：5的外圈区隔与二里头87M57：4龙鳞纹融合的结果，因此推测日本美秀美术馆藏、甘肃广河齐家坪采集铜牌饰的年代应晚于二里头87M57：4，为二里头四期或者更晚。

Ba型Ⅰ式铜牌饰，额部除美国檀香山艺术学院藏为戴羽状高冠，其他

均为后卷高冠，其下长条形底座与头部相接。该型纹饰比较繁杂，中轴对称，镶嵌规整，外圈镶嵌，说明存在时段更接近Aa型二里头81ⅤM4：5铜牌饰，但铸造花纹的形式又与其镶嵌方式有别，时代可能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或者四期。Ba型Ⅱ式中，保罗·辛格藏品第1件、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第2件的纹饰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第1件、二里头84ⅤM11：7基础上的创新，基本的纹饰元素均存在，但是心形纹、水滴纹、菱形纹等均非二里头文化所见因素，或为后期仿制作品，时代要晚于二里头84ⅤM11：7即二里头文化四期。Bb型铜牌饰中，二里头84ⅤM11：7制作比较规整，中轴对称，其他则简化了这一型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其他因素，仅头部纹饰一致，额冠则各有特点。保罗·辛格藏品第2件、甘肃天水秦城采集、1999年纽约“古代中国青铜器与陶器展”铜牌饰的年代应该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或者更晚。

C型铜牌饰的形制、纹饰与二里头差异较大，保留了对称的形式，呈窄长形，直侧边，纹饰重复层叠，表达的含义应不同，时代应该较晚。

二、铜牌饰形象构成解析

1. 眼睛

目前所见铜牌饰的眼睛可以分为圆形眼和梭形眼，不少学者认为这两类眼睛存在二元对立，即雌雄或阴阳之别^[4]。关于圆眼有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中的圆眼与太阳崇拜有关^[5]，是太阳神，是光明的象征^[6]。饕餮纹表示的是生死之界的穿越，眼睛或者是另一个世界，或者是神灵^[7]，具有让人恐惧、尊神压邪的功能^[8]。兴隆洼遗址M4中墓主人眼眶镶嵌玉块，红山文化女神像的梭形眼以碧玉镶嵌，均起到以玉示目的作用，选择使用玉块或者玉球镶嵌眼睛表示该文化中眼睛与玉存在某些关联。玉有着特殊的象征意蕴，与社群的集体记忆相关，是基于“眼睛威力”的信仰和对眼睛的再造^[9]。梭形眼广泛存在于红山一小河沿文化系统中，并且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彩绘中得到发展，有学者认为这影响了铜牌饰中梭形眼的产生或发展^[10]。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中眼睛被抽象成一种文化符号，是原始宗教信仰、世界观、宇宙观的一部分，具有独特的仪式象征意义和深厚的宗教文化意义。

南方地区圆形眼、梭形眼与特定形象的对应关系比较明显。不带獠牙、圆眼是鸟类特征，带獠牙、梭形眼则与兽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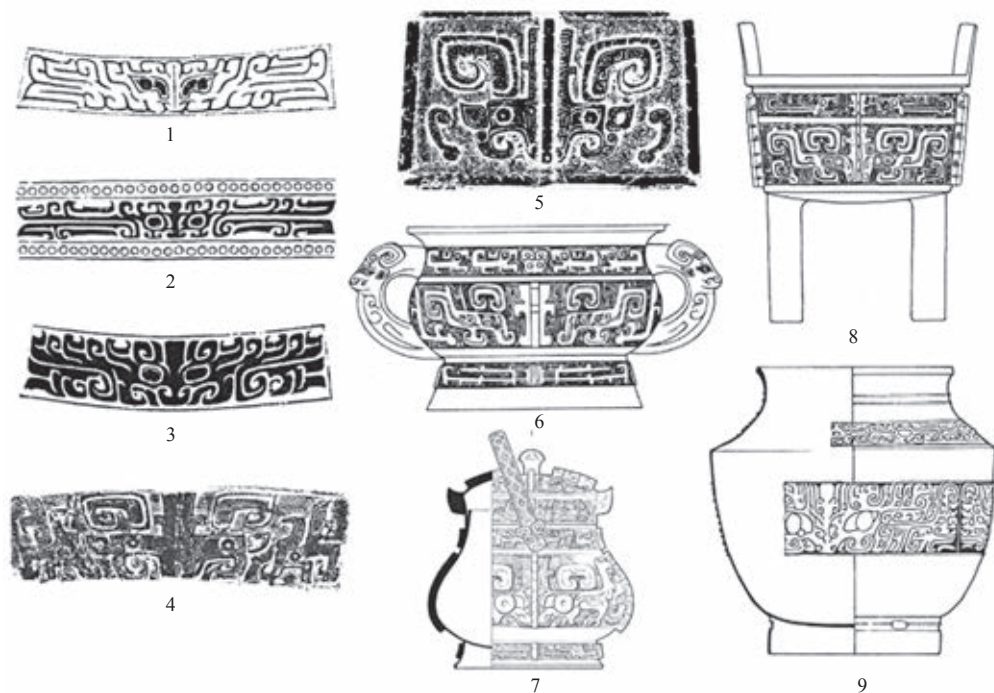


图3 商代兽面纹额冠

1. 湖北武汉李家嘴鼎(M2:55) 2. 河南安阳殷墟鼎(M333:R2053) 3. 湖北武汉李家嘴罍(M1:13) 4. 河南安阳妇好墓甗(M5:830) 5. 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罍(M54:43) 6. 河南安阳大司空簋(M303:81) 7. 河南信阳罗山天湖提梁卣(M57:13) 8. 河南安阳大司空鼎(M303:114) 9. 湖北武汉盘龙城鼎(PTZ:0136)

配,良渚的兽面纹“神人”的面相应该是鸟的面相,如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表现的是鸟和猛兽的形象^[11]。后石家河文化中玉神面多采用梭形眼或枣核眼设计,而玉蝉和玉兽面则常见圆形眼睛;梭形眼也主要出现在神面与虎面的造型中,前者与石峁皇城台双眼石雕造型也比较接近,应存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神祖面像的眼睛造型由无明显眼珠的不对称梭形眼,逐渐向“萌芽期‘臣字眼’”发展,“‘臣字眼’可能较早就萌芽自江汉地区,再传播至黄河中游,影响了商代艺术风格”^[12]。

采用半球形或者圆形绿松石片嵌入眼眶的方式,是对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早期玉石镶嵌工艺及信仰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新砦二期的T1H24:1陶器盖、二里头二期的02VM3绿松石龙形器等龙均为梭形

眼,在龙类遗存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风格,尚处在由梭形眼向臣字眼过渡的阶段,是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社会作用和意义的精神文化象征。A型铜牌饰在构图设计、镶嵌方式、形象等方面与B型铜牌饰均不同,与本地的龙类遗存也有区别,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或为文化交流的产物。

2. 额冠

学界普遍认为,B型铜牌饰顶戴T形高冠,笔者赞同冠的观点,但略有不同。有学者认为84VM11:7铜牌饰背部的蘑菇状花纹是商代青铜器上龙头的纺锤状角的原型^[13]。纺锤状角通常为双角而非单角,一些侧视的玉龙显示是单角,铜牌饰为正面视角,其蘑菇状花纹应是额部的冠饰。二里头84VM11:7铜牌饰的兽面、额高冠和顶部三叉装饰与谭家岭玉冠饰W9:60(图4-9、10)的设计相似,前者的额冠两侧下垂内卷,与孙家岗玉冠状器(M141:7)(图4-11)、谭家岭玉冠饰(W9:62)(图4-12)中的后卷高冠形制相似,其正视图呈现上宽下窄的倒梯形,而倒梯形的额冠在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中比较常见。以角鲛为兽面的中线,或认为是一个兽形中劈为二,或认为是两个动物纹样面部接合在一起^[14],角鲛的顶部存在圆角倒梯形的



部分,“仔细观察青铜器花纹这个位置,不难发现这不是动物肉体应有的形象,而是外加在那里一个成分,这种冠形还在青铜器的带状纹饰中独立存在,更证明它不是动物肉体的一部分”^[15]。由于圆角倒梯形仅出现在额部上方,本文暂称为额冠,它不同于凌家滩玉人覆盖整个头部的介字冠帽,可能反映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二里冈期李家嘴鼎(M2:55)(图3-1)上的兽面纹额冠尚较简单,基本以圆角梯形或倒梯形的形式出现,但也存在简单额冠旁边饰以竖向羽翼的形制,如盘龙城所出

罍(PTZ:0136)^[16](图3-9)。这与美国檀香山艺术学院藏铜牌饰额部所饰对称羽翼有相似之处,其基本形制在殷墟一期小屯鼎(M333:R2053)(图3-2)、李家嘴罍(M1:13)(图3-3)得以保持,到了殷墟二、三、四期,妇好墓甗(M5:830)(图3-4)、花园庄东地罍(M54:43)(图3-5)、罗山天湖提梁卣(M57:13)(图3-7)、大司空鼎(M303:114)(图3-8)的额冠中部两侧伸出两个对称分布、大小一致的凸起,且出现了殷墟四期大司空簋(M303:81)(图3-6)将此类额冠作为装饰带区隔单独使用的情况。

额冠在史前已经存在,往往具有宗教、社会、审美等多重功能。有学者称之为篦形饰,认为由河姆渡文化中双鸟飞升介字冠演化为良渚文化的倒梯形冠,之后发展为殷中期的饕餮纹,并将额上有这一纹饰的一类称为帝,是太阳带来丰穰、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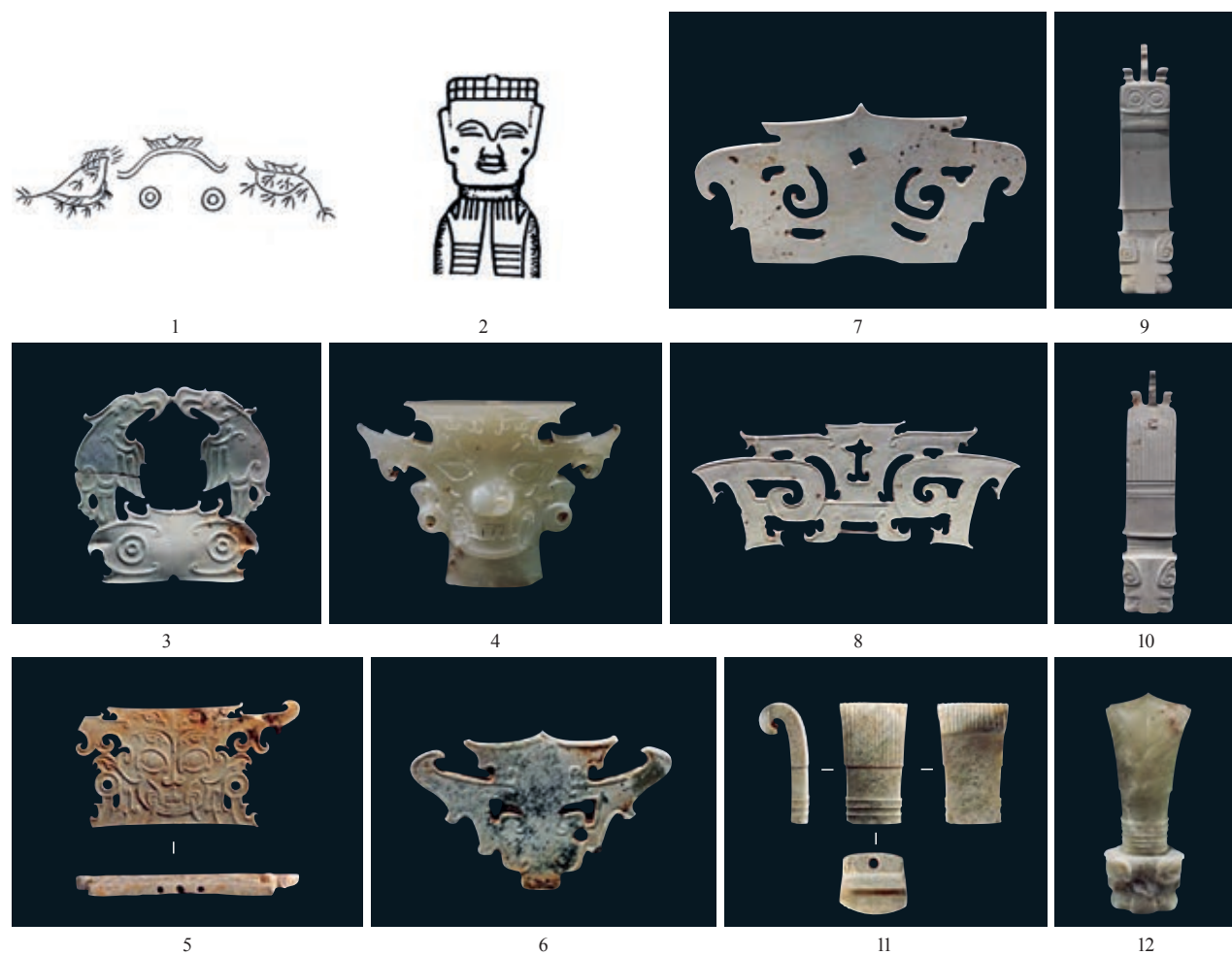


图4 早期介字冠、平顶冠、高冠

1. 浙江宁波河姆渡陶盆(T29④:46)双鸟神祖面纹 2. 安徽含山凌家滩玉人(98M29:14) 3. 湖北天门谭家岭虎脸座双鹰(W8:13) 4. 湖北天门谭家岭神人头像(W9:7) 5. 湖南常德孙家岗玉獠牙神面(M149:1) 6. 湖北天门谭家岭玉虎头像(W8:11) 7. 湖北天门谭家岭冠饰(W9:59) 8. 湖北天门谭家岭冠饰(W9:50) 9. 湖北天门谭家岭冠饰(W9:60)背面 10. 湖北天门谭家岭冠饰(W9:60)正面 11. 湖南常德孙家岗玉冠状器(M141:7) 12. 湖北天门谭家岭冠饰(W9:62)

产的“帝”的神德^[5]。也有学者将整个兽面纹中脊的纹饰称为鼻纹^[17]。还有学者认为是几、卵形额冠，具备置换性，但是种类比较单一^[18]。长江中游地区后石家河文化中存在两种冠。一种是介字冠，例如谭家岭玉虎头像（W8：11）（图4-6）、冠饰（W9：50）（图4-8）、冠饰（W9：59）（图4-7）、虎脸座双鹰（W8：13）（图4-3）、冠饰（W9：62）（图4-12）。其中冠饰（W9：62）为一兽面头戴高介字冠，可分为三部分，上部的介字冠呈上宽下窄高耸，中部减底，下部三道凸棱。另一种是平顶冠，额部仍为介字纹，例如孙家岗玉獠牙神面（M149：1）和谭家岭神人头像（W9：7）头部所戴。玉冠状器（M141：7）也是平顶冠，有学者称之为“气束冠”^[19]。正视图为上部略宽的倒梯形，整体分为三个区域，上部密集的竖向细直线构成冠的顶部并整体向后部弯曲，中部为减底长方形

区域，下部为两长方形凸棱，平底且中部钻孔。谭家岭玉冠饰（W9：60）比较繁杂，兽面耳内卷，凸鼻，眼部区域减底，圆眼，额部上方为长方形冠，分四个区域，下部为减底弦纹区，中部为素面凸块区，上部为竖向弦纹区，顶部为三叉形，冠的中上部区域整体向后卷曲，背面顶部饰圆眼兽面纹。这两类冠饰实质是羽冠，原型为鸟尾翼。有学者将后石家河文化戴气束冠神面玉器窄长发展的趋势与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藏柄形玉神祖面嵌饰器进行对比，认为柄形器由石家河文化神面像演变而来^[20]。二里头玉柄形器（2001VM1：3）（图5-7）、玉柄形器（VKM4：1）（图5-6）、三区M1新出神面纹玉柄形器（图5-1）、玉柄形器（ⅢKM1：6）（图5-2）均与谭家岭冠饰（W9：62）、孙家岗玉冠状器（M141：7）相似，戴竖向细直线的倒梯形高冠，中部束腰减底，下部为两道凸棱，神面无眼，眉部为商、西周玉柄形器中常见的花瓣纹，方鼻，嘴角上扬。晋南清凉寺、陶寺均可见到后石家河文化因素的玉器，后石家河文化形成后对外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并深度参与了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21]。我们认为戴冠兽面纹是后石家河文化北渐的表现，也是B型铜牌饰梭形眼及高冠组合的例证，证实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联系。

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陶器刻有一双眼头戴介字冠的神面纹（图4-1），介字冠位于额部正上方，比较小，两侧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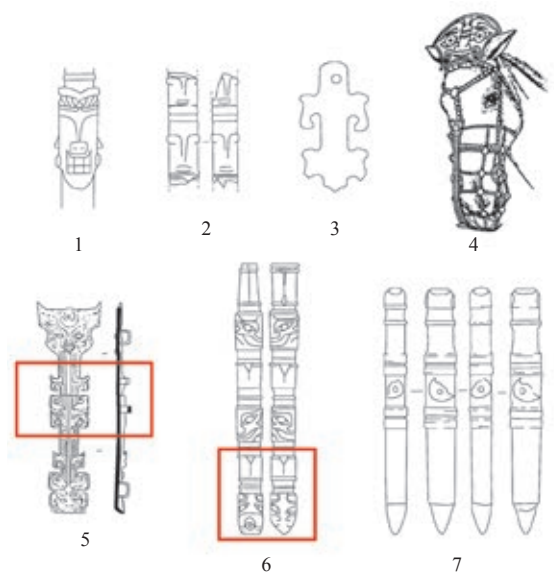


图5 柄形器、额冠

1. 河南偃师二里头二期三区M1玉柄形器 2. 河南偃师二里头玉柄形器（ⅢKM1：6） 3. 内蒙古赤峰大甸子雕花坠（M383：11） 4. 陕西西安沣西张家坡二号车马坑一号车马饰复原图 5. 陕西宝鸡扶风强家当卢（M1：43） 6. 河南偃师二里头玉柄形器（VKM4：1） 7. 河南偃师二里头玉柄形器（2001VM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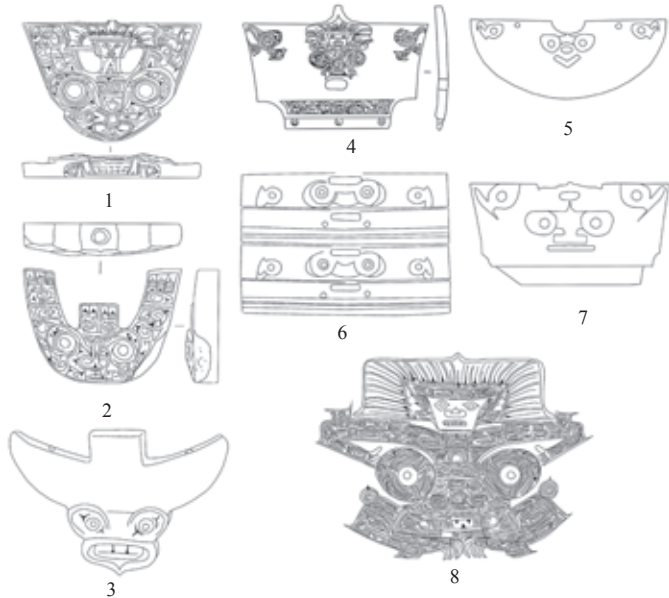


图6 良渚文化玉器

1. 浙江杭州瑶山玉牌饰（M10：20） 2. 浙江杭州瑶山三叉形器（M3：3） 3. 浙江杭州瑶山玉鸟（M2：50） 4. 浙江杭州瑶山玉冠形饰（M2：1） 5. 浙江杭州反山玉璜（M23：67） 6. 浙江杭州反山玉琮（M12：98）侧面 7. 浙江杭州反山冠状器（M22：11） 8. 浙江杭州反山玉琮（M12：98）神徽



一只飞鸟，为介字冠的早期形制；凌家滩文化玉人（图4-2）、良渚文化神徽中的神人（图6-8）头顶均戴覆盖整个头部的介字冠帽，而瑶山玉牌饰（M10：20）（图6-1）的兽面额部中央为倒梯形戴介字冠帽的神人，此阶段已经发展为比较复杂的形式。若将良渚文化的神徽看作一个整体，神兽额头顶戴人形的冠^[15]，其简化形式与二里头（84ⅧM11：7）倒梯形额冠形状基本一致。瑶山玉牌饰（M10：20）中的倒梯形额冠以及瑶山玉冠形饰（M2：1）（图6-4）、反山冠状器（M22：11）（图6-7）整体呈倒梯形、顶部为介字冠更证明了这一点。将瑶山玉鸟（M2：50）（图6-3）上下两部分分拆，下部为鸟首，上部的两翼及中部的凸起方块，与瑶山玉三叉形器（M3：3）（图6-2）在构图设计上一致，后者的形象来源或为前者的上部，正面为兽面，中部的凸起与兽面额部的冠饰结合为一体，其顶部存在其他装饰物的钻孔。据此推测，瑶山玉鸟（M2：50）凸起的方块也为额冠，结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鹰纹玉圭神面中部戴冠两侧带羽翼推测，其两翼或为额冠饰的一部分，亦为羽毛，即为羽冠。而这种与鸟结合的题材在瑶山玉冠形饰（M2：1）、反山冠状器（M22：11）、反山玉琮（M12：98）上也有体现。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二里头铜牌饰84ⅧM11：7、玉柄形器VKM4：1，下部为兽面，额上部为两角略后卷的额冠，下方的横长区域或为冠的一部分，这些均与良渚文化的构图思想一致。这种构图也见于谭家岭冠饰（W9：60）、孙家岗玉冠状器（M141：7），两者上部高冠、额部接触的区域为横向内束区域均是冠饰的一

部分。倒梯形冠饰或以凸块状鸟尾翼为原型，进而发展为倒梯形的羽冠，这与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倒梯形额冠在形象设计及构图思想上基本一致。

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雕花坠（M383：11）（图5-3）顶部有一钻孔^[22]，原本或不是坠饰而是兽面戴高冠的额冠，残断后作为坠饰二次使用。笔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兽面+额冠”的因素已经向北传到了大甸子。也有学者对殷墟出土的马额冠进行统计分类，认为可以分为贝壳形饰、圆形铜泡、水滴形饰、兽面形饰等几类，伴随车马同时在殷墟出现，是否为当卢需要斟酌，但基本发现于马额头原位^[23]。西周仍存在马额冠遗存^[24]，以西周张家坡二号线车马坑出土的马冠饰（图5-4）为例，有学者认为马头顶的青铜镂刻兽面饰为钺（作锡）^[25]。扶风强家当卢（M1：43）（图5-5）下部两组一致的兽面额饰高冠，中部侧出扉牙，与大甸子雕花坠、同时期的青铜器饕餮纹额部的纹饰一致。兽面高冠的文化传统经过史前、夏商周三代，并未中断，且在继承中创新，传播范围非常广，形制上存在一个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

三、形象来源与功能

1. 形象来源

A型铜牌饰是龙、鼉等动物崇拜的表现，主要来自北方的红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Aa型铜牌饰额上部塑造了一对对称内卷的蘑菇角。关于蘑菇角的原型，学界主要有鹿类角说^[26]、鳄鱼皮角质说^[27]、旗帜说^[28]等几大类。笔者认为牌饰的面部形象可能来自虎，蘑菇角取自鹿角角柄，但是细部移植了其他动物个别特征。Ab型铜牌饰的龙鳞纹见于陶寺遗址的4件彩绘龙陶盘，陶盘中盘龙呈蜷曲状，龙首在外，头部吐须，饰黑彩红底相间的龙鳞纹，这类龙鳞纹在辽西地区的赤峰红山后遗址及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的彩绘陶瓮上均已出现，红山文化时期龙鳞纹已经定型，是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交汇的产物^[29]。有学者认为殷墟甲骨文中的龙是鳄鱼的形象^[30]。目前在黄河流域多处遗址发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鳄鱼遗存，大汶口文化晚期鳄鱼制品特别是鼉鼓随葬于墓中首先在海岱地区出现，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龙山文化时期陶寺先民将鼉鼓与石磬搭配随葬于墓中并形成制度^[31]。鳄鱼遗存与礼制相结合的发展，展现了中原地区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特质。从铜牌饰的整体纹饰看，多组龙鳞纹并排、口部不吐须的特征与陶



寺彩绘龙并不一致。日本美秀美术馆藏铜牌饰上的半月形龙鳞纹与山西石楼铜觥上鳄鱼鳞甲的表示方式是一致的，前者的半月形龙鳞纹是陶寺彩绘龙盘龙鳞纹的简化形式。故**Ab**型铜牌饰的形象是陶寺彩绘龙与鳄鱼的结合，在继承黑红彩绘的基础上，以其形式与鳄鱼背部纹饰相融合，赋予龙的外形特征，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对龙的新认识。

B型铜牌饰兽面额部高冠的形象也是龙。在良渚文化神徽、后石家河文化玉兽面冠饰基础上，同时继承了北方地区龙形象特征，中原地区的龙文化崇拜得到发展。考古发现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类遗存有很多，如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湖北黄梅焦墩遗址的卵石摆塑龙、红山文化玉猪龙、良渚文化的龙首镯、陶寺彩绘龙盘、后石家河文化罗家柏岭玉龙环，均表明龙崇拜起源很早，这些不同时期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龙表现形式和风格必然不同，承载着各文化中的宗教或礼仪功能。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龙源于陶寺文化和良渚文化^[13]，也有学者认为以牌类为代表的龙的造型与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中的东方文化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直接来源应该是新砦文化^[32]。与**B**型牌饰相近的龙类形象强调面部特征、额部饰冠，而突出面部特征的牌饰起源非常早，兴隆洼文化兴隆沟第一地点**F34**内**M25**墓主人右侧腕部出土1件人头圆形骨牌饰，瓦状隆起、有系孔，但形制相对原始^[33]。凌家滩文化**98M16:2**、红山文化**C**型玉龙、赵宝沟文化小山尊形器猪首龙、罗家柏岭玉龙环和陶寺彩绘龙盘中的龙具有长条蜷曲躯体、无爪的特征，为二里头文化所继承，但后者躯体多舒展、卷尾，大面积强调

面部且新出现一首双身、有鳍有爪龙；前面所列者除陶寺彩绘龙以外，其他额部均装饰后披鬃毛，或是早期龙首额冠饰的雏形。兽面戴冠最早出现于良渚文化玉琮的神人兽面纹，与瑶山玉牌饰（**M10:20**）、瑶山三叉形器（**M3:3**）表现一致，冠饰的形制有所区别。而瑶山玉鸟（**M2:50**）与谭家岭神人头像（**W9:7**）、孙家岗玉獠牙神面（**M149:1**）的平顶冠及两侧的羽翼造型风格及文化内涵一样，前者表示的也是玉鸟头戴平顶冠，两侧羽翼。“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从造型风格和雕刻技术上看，在本地和中原均无源头，当承袭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华东系’的发达玉器传统，但在透雕和减地阳纹等技术上又有明显的进步，是为本地化的创新。”^[21]殷墟甲骨文中的龙均为长躯、卷尾、戴冠，是对二里头文化时期卷尾、戴冠龙遗存的继承。

C型牌饰的基本形制与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相异，表现的形象比较抽象，无法与具体的某一动植物对应，采用的是重复排列、对称布局的方式。仓包包祭祀坑**87GSZ:36**强调眼睛，与三星堆青铜器突出眼睛的文化内涵相符。

2. 功能

二里头文化出土铜牌饰均与铜铃、玉铃舌伴出，已经形成一个较固定的组合，其墓主人或许有特定的身份。二期至四期出土铜铃的墓葬仅**M22**属于小型墓，其余为中型墓，均位于二里头宫城外的祭祀遗存分布区。腰部系铜铃的习俗应源自陶寺文化^[34]，或与宗教祭祀有关，但伴出铜铃的铃口方向均与墓主人头部方向不同，玉铃舌与铃口存在一定的距离，也有学者提出下葬时两者可能分开放置^[35]。笔者推测当时的玉铃舌上的系绳比较长，铜铃尺寸小，复原后铃舌位于铃口的下方而非铜铃内部，难以发出声音，或不当作乐器使用，这与二里头二期**02VM3**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伴出的铜铃内有铃舌的情况不同。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制已经形成，其社会的复杂性更多体现在等级制度化、礼制规范化上，墓主人身份高低贵贱有别，随葬器物受到严格限制，“器以载礼”特征突出^[36]。铃口方向均与墓主人头部不同、玉铃舌与铜铃存在距离的情况说明应是有意为之且形成规制。玉铃舌“下端周缘有撞击痕”^[37]，是实用器，下葬时将铜铃单独放置在墓主人身上或缝缀在胸前衣物上，不再具备实用功能^[2]。“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



各有雌雄”^[38]。“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39]这表明夏代应该存在专门御龙的官职，二里头出土大量的龙形象遗存也说明其对龙非常崇拜。复杂社会中与显贵集团相关的物质文化可以对这个地区的政治结构提供最好的启示，共同具有的一种风格可以当作政治身份的标志^[40]。笔者推测该铜牌饰组合是身份、地位、等级、权威的象征，是葬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彰显墓主人生前的职业、官职等。二里头文化特有的铜铃与动物主题组合的形式为商代所继承，晚商墓葬殉狗多装饰铜铃^[41]，应该是对这一传统的发展。

四、结语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可划分为三大类型，其中A型牌饰是具象化的动物形象，Ab型继承和发展了Aa型牌饰的部分特征，二里头文化二期铜牌饰上已经出现对称内卷的蘑菇角，二里头文化四期或者更晚以广河齐家坪为代表的牌饰是二里头81VM4:5的外圈区隔与二里头87M57:4龙鳞纹融合的结果。以81VM4:5为代表的Aa型牌饰的蘑菇角取自鹿角角柄，面部可能是虎的形象；以87M57:4为代表的Ab型牌饰背部有龙鳞纹，在继承黑红彩绘龙纹的基

础上，以其形式与鳄鱼背部纹饰相融合。两牌饰均赋予龙的外形特征，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对龙的新认识。B型牌饰均为梭形眼，倒几字形上颌及鼻部，耳内卷，与前部的几字形构成心形头部轮廓，额部戴高冠，纹饰均为铸出，绿松石嵌片纵向平铺整个牌面作为底纹。Ba型I式牌饰主要流行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或者四期，纹饰比较繁杂、中轴对称、镶嵌规整、外圈镶嵌接近Aa型。心形纹、水滴纹、菱形纹等非二里头文化所见因素出现在Ba型II式牌饰上，制作比较规整，中轴对称，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或者更晚。Bb型牌饰制作比较规整，中轴对称，头部纹饰一致，额冠则各有特点。笔者认为T形高冠应为额冠，与倒梯形冠饰构图思想、形象设计基本一致，以凸块状鸟尾翼为原型，发展为倒梯形的羽冠，并常见于商周青铜器饕餮纹。所戴额冠在良渚文化玉冠饰、后石家河文化玉兽面冠饰基础上，继承了北方地区龙形象特征，发展了中原地区的龙文化崇拜。之后并未消亡，从二里岗期到殷墟四期青铜器兽面纹额部的圆角倒梯形额冠由简单到复杂，演化为装饰带区隔，继承中有所创新，后世马冠或可追溯至此。C型牌饰的形制、纹饰与二里头铜牌饰差异较大，保留了对称形式，表现的形象比较抽象，时代应该较晚。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将半球形或者圆形绿松石片嵌入眼眶，继承与发展了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早期玉石镶嵌工艺及信仰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龙类遗存眼睛尚处在梭形眼向臣字眼过渡的阶段，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符号；铜牌饰、铜铃、玉铃舌组合是身份、地位、等级、权威的象征，是葬仪的重要组成部分，铜铃与动物主题组合的形式也为商代所继承。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审阅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谨申谢忱！

参考文献

- [1] 赵殿增. 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C]//宋镇豪, 肖先进, 三星堆博物馆,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21-128.
- [2] 王青. 远方图物: 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167-178.
- [3] 陈国梁. 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牌饰的来源[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三代考古(七).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65-83.
- [4] 王青. 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神徽饰纹的复原研究[C]//山东大学考古学系. 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8: 171-181.



- [5] 林巳奈夫. 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甚么: 根据同时代资料之论证[C]//樋口隆康. 日本考古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 香港: 东方书店, 1990: 135.
- [6] 方向明. 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研究[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文化研究: 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194.
- [7] 艾兰. 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M]. 杨民, 等, 译. 增订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09.
- [8] GOMBRICH E H. The sense of order: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decorative art[M]. Oxford: Phaidon, 1979: 264.
- [9] 吕红亮. “再造”眼睛: 史前眼睛信仰的探索[C]//邓聪, 吴春明. 东南考古研究(第4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185-193.
- [10] 顾问. 大甸子墓地陶器上的“特殊彩绘”[J]. 古代文明, 2008(7).
- [11] 陈星灿. 兽面玉雕、兽面纹、神人兽面纹[C]//远望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393.
- [12] 邓淑萍. 新石器时代神祖面纹研究[C]//杨晶, 蒋卫东. 玉魂国魄: 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242.
- [13] 杜金鹏. 中华龙, 华夏魂: 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C]//杜金鹏, 许宏.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 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96-121.
- [14] 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441.
- [15] 李学勤. 走出疑古时代[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7: 57.
-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 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462.
- [17] 李济. 李济文集4[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63.
- [18] 韩鼎. 饕餮纹多变性研究[J]. 中原文物, 2011(1).
- [19] 邓淑萍. 肖家屋脊文化神祖灵纹玉器初探[C]//湖南省博物院. 中国玉学·玉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3: 115-145.
- [20] 林巳奈夫. 圭について(上)[M]//泉屋博古館紀要(12). 1996.
- [21] 张海. “后石家河文化”来源的再探讨[J]. 江汉考古, 2021(6).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大甸子: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173-174.
- [23] 常怀颖. 殷墟车马器补议[J]. 江汉考古, 2019(5).
- [24] 康文琼. 出土西周时期马冠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22.
- [25] 杨英杰. 先秦古车挽马部分鞍具与马饰考辨[J]. 文物, 1988(2).
- [26] 闻一多. 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J]. 人文科学学报, 1942(2).
- [27] 何新. 龙: 神话与真相[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37.
- [28] 刘志雄, 杨静荣. 龙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11.
- [29] 郭大顺. 龙出辽河源[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59.
- [30] 杨钟健. 演化的实证与过程[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31-41.
- [31] 高江涛. 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的鳄鱼骨板探析[J]. 东方考古, 2020(17).
- [32] 顾万发. 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J]. 华夏考古, 2000(4).
- [33] 徐昭峰, 逢馥璐. 兴隆洼文化头盖骨牌饰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 [34] 张冲. 先秦时期陶铃和铜铃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4.
- [35] 许宏. 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J]. 古代文明, 2016(10).
- [36] 李志鹏. 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 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1-123.
-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 1992(4).
- [38] 洪亮吉. 春秋左传注: 卷18: 昭公二十九年[M]. 李解民,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792-793.
- [39] 吴任臣. 山海经广注: 卷7: 海外西经[M]. 栾保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233.
- [40] 布鲁斯·炊格尔. 时间与传统[M]. 蒋祖棣, 刘英,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177-178.
- [41] 安家瑗. 中国早期的铜铃[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7(1).